

中外书萃丛书



内幕新闻

沈从文著

Christina

内幕新闻

朱/选编

沈阳出版社

1988年·沈阳

责任编辑：赵 敏
封面设计：奚 贝
版式设计：王有平
责任校对：王有平 李东训

内幕新闻

宋 人 选编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8千字

印张 8.125 印数 28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193-6/Z·6 定价：2.90元

“中外书萃丛书”

前 言

自古以来，人们视读书为谋求仕途荣禄的阶梯。这未免过于褊狭而功利化了。虽说不乏饱学经纶之士，但以读书博取功名者，苦不堪言。一旦仕途舛错，或是将经典、诗文束之高阁，颓唐、消沉；或是慨叹人生，怨天恨地，玩世不恭；或是陶醉“肉体文学”寻找刺激，堕入末流。凡此种种，不得开卷有益的真谛，不悉实现自我的功力。这种狭隘的文化心态，至今犹存。

书，向人们展示一个个多彩奥秘的内心世界，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壮烈活剧。

书，凝聚着人类的良心、智慧和科学实践的硕果，是通向理想生活彼岸的灯塔和桥梁。

书，广及古今中外，天地寰宇，涉系文化历史，艺术宫殿，社会人生。

博览名著，神游书海，领悟先哲的思想风姿，洞察凡人的生活世态，追踪时代的前进足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千种山光水色，万般民情习俗尽收眼底，读书亦乐在其

中，心智则随之升华。

书海茫茫，何以作舟？读者怎能以有限的时间浏览浩瀚的书籍？群书芸芸，何以为佳？读者难能全方位地选择。为此，我们向朋友们奉献一套“中外书萃丛书”。

它是当代中外文化读物的窗口，是最新最佳的精神食粮。它可以不断地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它不是用荒诞、颓废、色情、猎奇之术以事招徕，而是让青年朋友汲取更多更新的文化信息，开拓知识视野，强化当代意识与竞争机制。编者的总体构想是：“中外书萃丛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思想指导下，力求从各种学科领域，各个文化层面和不同的角度去反映蜚声现代政界、艺坛及科学王国的伟人、名流的生活传记、心灵显影；环球风云的重大纪事、内幕新闻；异国地域的婚姻、家庭和情爱史；当代东西方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比较；展望未来的科学预言；历史时态的宗教传说；海内外禁书钩沉；著名畅销书赏析，等等。高尚与伟大共存，神奇与平凡相生，现实与未来交错，文明与愚昧撞击，形成丛书特有的文彩与风格。并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素质和审美判断能力，优化读者的改革意识和品德境界作为丛书的宗旨。

“中外书萃丛书”既有主体的宏观意识，又使每分册独立成章，有着鲜明的特色。在编选中去芜存精，力戒庞杂、空泛、乏味。在注重时代性、纪实性、信息性的同时，讲究趣味性、可读性、权威性和编摘的艺术技巧，使丛书成为开卷有益，雅俗共赏的佳品。为适应当前的读书热点，编者优先选择近几年我国出版的图书，以及尚未中译的国外畅销书，给读者一种贴近现实的新鲜感和充实感，使读者高屋建瓴，领略当今世界风貌及其社会文化思潮的态势，从而自信、自

强、自律，更新知识结构，建造高效能的知识塔。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承蒙有关出版单位的支持与鼓励，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我们深信，这套丛书会得到青年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任 达

1988年7月

目 录

“中外书萃丛书”前言……………任 达 1

政 坛 风 云

《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新闻……………	1
斯大林之子雅科夫的惨死……………	12
伪证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17
1977年世界秘闻——施莱耶事件……………	27
批判我的缘由——梁漱溟自述……………	46
“红色旅”绑架莫罗……………	52
印尼“九·三〇”事件……………	67
“闪电作战”——摩萨德营救人质始末……………	77

谍 海 生 涯

鼯鼠——国际间谍纪尧姆……………	89
“果馅行动计划”……………	102
暗杀杜鲁门总统的刺客……………	112

港警智扣戴笠	119
大特务李士群之死	127

环 球 纪 事

中东战争在幕后	142
“黄金三角”的中国人	154
日本皇太子选妃记	161

黑 幕 一 瞥

旧上海的黑组织	167
国民党“清查”纪实	171
晋见“领袖”须知	180
冈村宁次宣告无罪的内幕	187
侵华日军解剖孕妇的暴行	190

世 界 名 案

好莱坞疑案	202
尼古丁毒杀案	219
里昂信使案	228
胰岛素杀人案	235

《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新闻

〔美〕达斯科·多德

洪 钢译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从某些偶然而琐细的迹象中分析出安德罗波夫逝世的重大新闻，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表此消息的记者。文章曲折动人，而富于戏剧性，值得一读。

在 1984年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莫斯科宽阔的大街和广场在黄昏时分就显得空空荡荡了。人们都急于赶回家去，观看正在萨拉热窝举行的1984年冬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每天晚上人们都在关心国家冰球队的战绩，它是苏联运动皇冠上最珍贵的宝珠。在苏联，除了紧急状态，冰球占据着比政治更重要的地位。在那一个星期四，即1984年2月9日，看不出有任何在政治领域发生戏剧性事件的迹象。

这几天，有关尤里·V·安德罗波夫身体情况的传闻四起，这位只当了15个月的苏联领导人的人物秋天就住院了，至此已有173天没有公开露面。有报道说，他的病情已经恶化。然而在星期四那天，莫斯科的生活是平静的。我怀疑，

在权力经纪人圈子以外，这个城市里是否还有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西方，人们普遍用丘吉尔的名言称克里姆林宫是“锁闭在神秘之中的谜”——而在2月的夜晚，当我偶然发现情况异常时，我觉得这句描写尤其贴切。

我决定要看看苏联电视，后来证明这是我的运气。当时苏联正在举行议会的换届选举，星期四那天，最新步入苏联领导层中的K·利加乔夫第一次作全国电视广播讲话。我对他很感兴趣。但是，当我那晚看着电视并试图对他的性格作一次评估时，我注意到在他的讲话中漏掉了一个陈腐的语句，而这语句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几乎是强制性的。我感到很震惊：他竟没有向托木斯克的人民转达安德罗波夫对他们的问候！

“说不定安德罗波夫已经死了呢。”我无意中对我的妻子说了这么一句。有没有可能这句话是让一位技术人员无意中删去了？根本不可能的事。那么，是让新闻检查人员有意删了？可为什么删了？依据谁的授权呢？

在利加乔夫讲话后播放的节目更增加了我的疑虑。苏联电视不加任何解释，临时改变了原排的节目，屏幕上出现了身着燕尾服演奏古典音乐的乐师。我妻子原想听的瑞典演奏的流行音乐节目被取消了。这样的节目更改与15个月前勃列日涅夫逝世那天何其相似！当时死讯是第二天早上宣布的。看来，全国性的举哀又将悄默无声地开始了。

我把房子里的两个电视机都打开，但当时的节目并不能告诉人们什么。我们吃着晚餐，边看着那次较详细的晚间新闻节目。结果，今天的电视广播的新闻只占极小比例，利加乔夫的讲话几乎是一笔带过。接着，画面转向了萨拉热窝，

转向了激动、欢乐和五彩缤纷，耳际充满着奥运会喧嚣的冰球场。这表明：一切正常。

当我穿过办公室时，我就决定，分析情况应当撇开连续的奥运会报道不管，一个苏联领袖人物去世，之所以要捂得严严实实，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继承问题解决之前，避免混乱或公众的恐慌，若取消一场国家冰球队比赛的电视转播，群情必然惊愕无疑。另外，这样不会使西方国家驻莫斯科的使馆吃惊地注意到这场危机，因为这是克里姆林宫生活中最脆弱乏力的时刻。我现在的任务是集中思想，寻找实证，然后作出估价。可那时，可以供研究的证据几乎没有。

证据吗？这东西要相对而言。在莫斯科，人们一般是通过对迹象和各种预兆的分析搜集证据，而不是通过第一手资料。使外国人感到愕然的是：莫斯科的重要居民不透露他们的家庭电话号码。然而，我手头确实还有几个官员的电话号码，在情况紧急时可以在家里找到他们。但我知道，这些人深信我是不会拿一些他们不愿在电话中谈论的问题去烦扰他们的。于是我干脆坐在办公室里，眼盯着悬挂在墙上作装饰品的苏联领导人图表，接班的是谁？会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吗？保守派会把这头等重任交给契尔年科吗？抑或是有另外的选择？

晚上10点。我的心里充满了焦躁，急着要做什么。我面前只有一个选择：给一个在苏联官场中重要的熟人瓦西亚打电话。两天前，我参加了一次盛大宴会，恰巧碰到了他。当时他对我说，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急剧恶化。他说：“我就知道这些。”第二天，我又听到一些内容类同的传闻，并写了一篇报道，称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病情已经恶化，且已失去说话的能力。

尽管瓦西亚曾经要求我不要单独晤面，但我们还是约定了遇到紧急情况时的电话信号。他坚持说，这样的暗号必须从公用电话里发出。如果有可能晤面，在20分钟以后，我可以我的办公室里接到回电，信号也是预先安排好的。

当我驱车前往地铁列宁图书馆时，整座城市寂静得可怕。我通常在这个地铁站的底层电话亭打电话。因为是夜间，只消10分钟，我就驱车来到目的地。当我经过武装部队参谋部大楼时，我注意到整幢大楼里灯火通明。在列宁图书馆站外，我看到一个军警正在来回巡逻着，另外还有两名士兵和一个军士。我注意到了这些不正常的迹象，打完电话就赶回分社去等候回电。

回电却一直也没来。瓦西亚可能不在家，要么就是他有意不理睬我的信号。

我来到办公室的专线报房。这个报房是《华盛顿邮报》与《每日新闻》合用的。收报机上，塔斯社正在流畅地发送着每日的新闻供稿，但是上面没有利加乔夫的讲话全文。路透社的新闻稿则集中报道中东事态。《每日新闻》记者真佐井江川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安德罗波夫的儿子伊戈尔这天早些时候突然离开了斯德哥尔摩。伊戈尔当时是参加一次东西方裁军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这是法新社从瑞典首都发回的专电。

我立即挂通了给法新社驻莫斯科分社的电话，回答是：我们没有更新的消息。然而，我原有的预感却因为这个消息而得到了加强。利加乔夫的讲话，流行音乐会的被取消，伊戈尔离开斯德哥尔摩——可以肯定，这些决不是偶然的事件。它们渐渐地汇合成同一个画面。除此以外，我还知道，这一夜总参谋部在紧张地工作，与勃列日涅夫去世的那天晚

上一模一样。而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到城里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场所看看是否也有异常的迹象。

已经11点多了，莫斯科的广播、电视仍在转播萨拉热窝奥运会的节目。我推想在奥运会节目播完之后，电视台将结束一天的节目，这意味着莫斯科市电台的广播将成为我唯一的消息来源。我找到报纸核对了电台的广播节目。有一家主要的电台在晚上11点35分时安排了爵士音乐节目。我想，这节目应该一锤子定音了。

我想跟一位我信任的同行讨论一下这事，兴许，我的思维进入了幻觉世界。南斯拉夫的南通社记者斯拉夫科·斯坦尼克可称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也是我的好友。因为相互间不存在什么竞争，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稿子到深夜，这样做受益多的恐怕倒是我，而不是他。在莫斯科的南斯拉夫人通常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和中国记者一样，都注视着苏联的国内新闻和思想领域的动态，而对这类新闻大部分记者基本上是不感兴趣的。于是我给斯坦尼克打了电话，告诉他午夜以后我将顺路去他的办公室。

在驱车往克里姆林宫时，我一路听着苏联体育节目广播员激动的声音。闪烁发光的汉白玉总参大楼依然灯火辉煌。我从这里向右拐去，驶向河沿的国防部大楼。这是一幢斯大林式的庞然大物。在我的脑子里，我可以准确地勾画出那几间接待室的所在范围；在正常情况下，深夜只有四扇接待区的窗户亮着灯。

可是，当我来到国防部大楼跟前，只见几百扇窗户灯火通明。那么多国防部人员深夜11点后仍在紧张工作，这一事实无疑地告诉我：正在发生非常事件！如果这不是因为领袖已去世，又会是什么呢？我迅即下车走向对街，开始数着亮

灯的窗户，可不久我就放弃了这种做法，我记起路透社有关中东战事的最新报道，于是想，国防部内所有的这些紧张也许都是由于贝鲁特异常危险的局势而引起的吧！

在驱车回市中心的路上，我听到小车里的收音机已结束了奥运会节目的广播，接着播送了一组简明新闻，我屏息静听。11点35分，固定的爵士音乐节目取消了。没有解释。无线电波传来的是恬静、优美的古典音乐。好啦，只有一种解释：安德罗波夫肯定逝世了。苏联领导集团挑选接班人的秘密会议肯定已在傍晚以后开始；同时，军用飞机已被派往横跨10多个时区的全国各地，把共产党的地方巨头以及中央委员会所有委员带回莫斯科。这就是安德罗波夫的儿子伊戈尔已被从斯德哥尔摩召回的原因了。我又把今晚所见的泄露天机的各种迹象放到这个画面里。显然，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到不了午夜，苏联的武装部队和政府警察部队克格勃的无线电发射机将把各种命令和电讯传往全国及世界各地。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真正感到了激动；我明白我正在发掘着一条巨大的新闻。说老实话，一个人逝世竟使我感到如此激动，我感到不安。但是在一个遮遮掩掩得令人困扰的国家里，我是发现了最受重视的绝密消息。

我把汽车停放在巍峨的罗西亚饭店附近，信步来到红场，向中央委员会大楼建筑群走去。在通往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个道口，每一个拐角，我都注意到有两个年轻人身着呢料大衣，头戴皮帽，在那里值岗。我知道，他们都是警卫人员。15个月以前在勃列日涅夫逝世时，我沿着同样的路径巡行察看了这座城市，并同样发现这样的人物在半夜以后，仍在打发他们的时间。

当我赶回车旁时，我心里已不再怀疑：安德罗波夫肯定

死了。可是，这就足以去写一条消息了吗？我回忆起几位苏联发言人作过的语调肯定的声明：安德罗波夫正在康复，预计在2月底作一次选举讲话。疑虑又一次占据了我。克里姆林宫即将易主的传闻几周来一直流传很广，可是迄今为止，它们都还缺乏实际根据。

当我来到南通社莫斯科分社，我发现斯坦尼克坐在收音机旁，表情严肃；我知道他肯定也意识到城里的异常气氛。后来我明白，他对于电视节目变动和城里具有战略意义的四幢大楼内的挑灯夜战倒是一概不知，然而他的本能以及在这简陋的房间里回荡的古典音乐使他断定：正在发生极不平常的事情。没等我告诉他我的收获，他就开了口：“许是老板吧。”他用的这个词，苏联人以此来称呼他们的领袖。

我们在一起分析着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搜寻着，试图为这个明摆着的结论找到另外的可能性，试图发现我们推理中的任何错误。我说，再过半小时，电台将开始对正在西伯利亚修建贝加尔—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铁路的年轻人广播。那儿与莫斯科相隔6到8个时区。如果固定的5分钟幽默节目被取消而续之以古典音乐，那么事情就趋于明朗了。斯坦尼克说：“那样，毫无疑问，安德罗波夫一定是去世了。”

我感到斯坦尼克正在振作精神，准备发一条消息。对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这属于绝对敏感新闻。斯坦尼克特别讲究新闻事实，即便时间已经这么晚，他还是决定要去一个就住在近处的苏联朋友那里，核实他的报道。

我现在急于告诉我的编辑，我要发这么一篇报道。一回到办公室，我便打开收音机，等待着对西伯利亚年轻人的广播节目，当听到用吉它弹奏的古典音乐时，我信心倍增，感

到我可以通过专线电报直接拨通华盛顿总社值班室并告诉他们我的报道了。外事副主编里克·温特劳布跑来与我在用户电报上进行交谈，我以稍稍隐晦曲折的语言对他说，我准备发一条消息，内容大体与我在1932年11月20日（那是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日子）发的消息相同。

我困难地敲击着字键，不时地打错字母，完全凭借着一种紧张不安的精神工作，而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连续几个小时，我都处在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我很清楚，我们之间通过用户电报的交谈在克格勃的某一个办公室里正在被监读着，我担心，华盛顿的编辑先生会就消息来源对我提问，或者要求解释——而在并不保密的路线上这么做，这恰恰是我所不愿意的。所以我变得焦躁、不耐烦起来。然而，温特劳布却是一个考虑周全、国际知识丰富的编辑。他让人感到镇静。他对此的反应是低调的：他立即明白了当时的情形以及我试图达到的目的。我说，我正在写一篇讣闻，可现在，因为意想不到的事情缠身，我无法写完它。我建议，这最好能在华盛顿完成，因为我有其他事情要做。他说：“别着急。接着干下去。离《邮报》的第一次截稿时间，现在还有两个小时！”

我们终于结束了这场用户电报交谈，我如释重负。我驱车前往斯坦尼克的办公室，此时，我却发现街上又重新部署了军警值岗。我在交通管理色灯前停下了。突然，一辆官方的黑色轿车鸣着喇叭，以每小时八九十英里的速度，闯过红灯，风驰电掣而去；另有两辆黑色伏尔加轿车朝着相反的方向急驶而过。

我发现，现在斯坦尼克要发出报道的决心更大了，尽管他的深夜造访只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警察异常紧

张。他忽然又想起了什么，有点不自然地补充道：“我得给我的大使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他。”毕竟，南通社是国家的通讯社，我却是除了我的编辑以外毋须与任何人商量此事，我想我是多么幸运。然而，我也确实想到，南斯拉夫的驻苏大使米洛伊科·德鲁洛维奇享有接近克里姆林宫领导集团的很大便利，这或许是有帮助的。

当我听着斯坦尼克向这位准是睡眼惺忪的大使简述这篇报道内容时，时间已经过了凌晨两点。大使是满腹狐疑，从谈话中我听得出来，大使正劝说斯坦尼克放弃发稿，只听斯坦尼克却坚决地说：“大使同志，我是为南通社工作的，南通社应该有这条新闻，这是我的判断。我只是想应该通报你。”放下话筒，斯坦尼克就把大使的反对意见摘要传达给我。大使说，他的副职就在那天晚上还与一些高级的苏联官员叙谈过，并向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大使的这一评论，使我感到心烦起来。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小心谨慎的外交官，曾经出任过驻北京大使。我们还在讨论着大使的见解。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过来了。斯坦尼克告诉我：“他向周围人员核对过了，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是我弄错了，安德罗波夫活得好好的。”

然而此时我的主意也已确定了。广播里播送的音乐正慢慢从古典转向葬礼，而当我驱车赶回我的办公室时，这篇报道已经在我的脑子中形成了。

我把报道写得很拘囿，可是稿子发回报社以后，我不免感到忧虑。

此时，在华盛顿展开了另外一个故事。

不出所料，在温特劳布收到我最初的报告后，《邮报》的编辑、记者们立即与白宫、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其他